

利用名人当工具的心理战争

利用名人当工具的心理战争 [=F]——在国际关系与司法中创造伪意识 [=K] 尼尔斯·哈恩 (Niels Hahn)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在西方，很多人是通过好莱坞电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血钻石》和尼古拉斯·凯奇的《战争之王》才了解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境内发生的冲突的。

但是，当塞拉利昂的特别法庭传唤了超级名模娜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和好莱坞明星米亚·法罗(Mia Farrow)在利比里亚前总统泰勒案中作证后，发生在西非的冲突遂有了新的焦点。

根据首席检察官布拉达·霍利斯 (Brada Hollis) 的说法，这位好莱坞明星及超级名模持有“关于泰勒案的重要信息，即泰勒是否在历史上某个特定的时间拥有裸钻，如能够证明这一点的话，检方对泰勒接受来自塞拉利昂反叛军的裸钻并使用这些裸钻图谋私利，以及为塞拉利昂反叛军采购军火弹药的起诉即能成立”。检察官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出，在一场 1997 年由曼德拉做东于南非举办的晚宴后，坎贝尔是否收受泰勒馈赠的钻石。{{Brenda Hollis,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BBC”, Broadcasted August 4, 2010, <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10864688>.}}

然而，我们仍然不能确定的是，单凭几颗给了超级名模的钻石，为什么就能证明泰勒和血钻石以及他对塞拉利昂反叛军“革命联合阵线”(RUF)的支持，甚至证明他犯有违反人道罪，这项罪名是泰勒受审的重要指控。

传唤坎贝尔和法罗出庭作证正是美国拿手的心理战手段，利用名人制造有关国际司法的伪意识。{{{心理活动和心理战 (PsyWAR) 在实践中可能难以区分。有关这些 (运用特殊手段的) 战争概念的更多信息，参见 US Department of Defence (1993),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Memorandum of Policy No. 30, “Command and Control Warfare”, issued on 17 July, 1990 and the 1st revision on 8 March, 1993, http://www.dod.gov/pubs/foi/reading_room/732.pdf.}}}这个宣传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公众支持，运用民主、人权和国际正义等正面的价值，借机合法化西方国家主导的在资源丰富的西非国家的军事介入。

有正当性危机的争议法庭

从我过去七年对利比里亚的深入研究来看，对泰勒的起诉、逮捕和审判都充满了极度的争议性。{{{这一研究是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 做相关的博士论文时完成的。后者关注的是新自由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当代样式。数据是在利比里亚几年的实地研究中搜集的，包括对 150 多名参与西非地区武装冲突的要人的采访，其中包括若干前任和现任部长和国家元首，多半冲突集团的军官，还有学者和市民社会团体，等等。}}}

在西方的主流媒体和学术研究中，泰勒的审判是国际正义在非洲实现的范例。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许多非洲的政治人物、学者和评论员，无论其政治背景偏左和右，都视泰勒的审判是新殖民主义之司法权在非洲的扩张，因为它选择性地起诉了非洲的政治人物，凡是不和华盛顿、伦敦或巴黎合作的，就被起诉。

泰勒的案例是第一位民选总统尚在位时就被准国内法庭 (审理战争罪行和反人道罪行) 起诉的例子。该特别法庭是英国和美国通过联合国安理会 1315 号决议所成立的，该决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必须与塞拉利昂的政府谈判，并建立一个独立的特别法庭。{{{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315, Article 1,<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N00/605/32/PDF/N0060532.pdf?OpenElement>.}}

2002年1月16日，联合国和塞拉利昂共和国政府签署一项协议，建立了塞拉利昂共和国特别法庭，“并拥有权力，起诉任何自1996年11月30日之后，在塞拉利昂共和国境内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及塞拉利昂共和国法律的人”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of Sierra Leon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 Article 1,<http://www.sc\sl.org/LinkClick.aspx?fileticket=CLk1rMQtCHg%3d&tabid=176>.}}}

当时，由总统艾哈迈德·泰詹·卡巴（Ahmed Tejan Kabbah）领导的塞拉利昂共和国政府，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都受到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例如，1997年5月，由参谋总长约翰尼·保罗·柯洛马（Johnny Paul Koromah）领导的几位陆军军官的合作势力，和RUF合作，成功地赶走了卡巴总统。

英国随即于7月中止了塞拉利昂共和国在英联邦中的权利。同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对塞拉利昂共和国实施制裁。{{{“What can the Commonwealth do?”,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2/hi/africa/749078.stm>, May 15, 2000.}}}

军火交易研究中心及世界政策中心的汀娜·蒙塔古（Dena Montague）注意到：许多外国采矿公司，如由约翰·雷蒙·布勒（Jean-Raymond Bulle）领导的“美国矿产”希望卡巴总统重新执政，于是，他们表达了以财力支持卡巴复职的意愿，希望以此交换钻石的开采权，但是该公司并没有军事能力支持。{{{D.Montague, “The Business of War and the Prospects for Peace in Sierra Leone”,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IX(1), 2002, p.235.}}}据美国陆军官校的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K. Adams）透露，由英军前上校提姆·史派瑟（Tim Spicer）执掌的私人军事公司“国际沙线”（Sandline International），于1998年3月通知媒体，塞拉利昂共和国的英国大使馆要求“国际沙线”协助训练一支当地武装部队，以赶走这些推翻卡巴的将军们。十个月之后，总统卡巴成功地复职了。{{{T. K.Adams, “The New Mercenaries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Conflict”, US Army War College 29(2), 1999.}}}

当时，塞拉利昂共和国人民对于外国的私人军事公司已经非常熟悉。早在1995年，一个于1989年在南非成立的私人军事公司“执行结果”（Executive Outcomes），稍后于1993年在英国注册，尔后将反对卡巴的势力赶出首都弗里敦，同时也将他们赶出了钻石产区。亚当斯也注意到，这个行动由布兰奇能源公司（Branch Energy Ltd）资助，该公司属于以巴哈马为基地的英国公司“战略资源集团”（Strategic Resource Groups）所有，同时也拥有“执行结果” {{{Ibid.}}}。然而，“国际沙线”的迈克尔·格伦伯格（Michael Grunberg）指出，他在2002年已经知道，塞拉利昂共和国对“执行结果”及其他服务公司的付款能力，相当程度取决于其他国际资助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持续支持。支付“执行结果”的款项其实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间接支持。{{{M.Grunberg, “Comment by Sandline International”, <http://www.sandline.com/comment/list/comment43.html>, 4 June 2002.}}}

2000年，卡巴政府面临新的问题，反叛军“革命联合阵线”在钻石矿产丰富的东部省份挟持数百名联合国武装人员为人质，英国部署了约一千名士兵直接介入镇压反叛军的活动之中，并逮捕反叛军领袖佛德·桑科。{{{BBC News, http://news.bbc.co.uk/2/hi/in_depth/africa/2000/sierra_leone/default.stm, January 6, 2003.}}}该事件发生在布莱尔发表其有关1999年轰炸科索沃的“国际社会原则”没多久，其实是寻求以人权、民主和自由贸易之名，使军事侵略行动合理化。{{{T.Blair, “Doctr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ttp://www.globalpolicy.org/globaliz/politics/blair.htm>.}}}

如同当初在科索沃发生的情况，在塞拉利昂共和国的入侵也被形容为“人道介入”，而“血钻石”的概念也变成了一个控诉反卡巴政府势力所犯下的可怕惨剧的有力工具。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了塞拉利昂共和国的特别法庭，也解释了为何该法庭从一开始在西非就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该法庭被批评为一个英国或美国的“事实上”的法庭，理由是它由英国和美国资助，所有的首席检察官皆为英国或美国籍，例如戴维·克朗（David Crane）是一个美国陆军的前雇员。{{{见锡拉丘兹大学戴维·克朗的个人档案，<http://www.law.syr.edu/faculty/facultymember.aspx?fac=152>。}}}起诉的案件也被指控为根据英国和美国的外交议题有选择地起诉个人，这些议题是为了维护英国和美国在该地区的新殖民优势，保护英美私人公司开采自然资源的权力，例如钻石、黄金、石油和铀，等等。这一批评是深植于泛非长期的反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历史之中。

2003年泰勒被起诉

2003年6月4日，泰勒被该特别法庭起诉，他被起诉的过程进一步增添了对塞拉利昂共和国特别法庭的批评。

正当利比里亚政府与另外两个反叛军部队即“利比里亚民主与和解联合”（Liberians united for Reconciliation and Democracy）和“利比里亚民主运动”（the Movement for Democracy in Liberia）之间的和平会议要在加纳召开之时，该特别法庭的首席检察官戴维·克朗通过“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发出传票，指控泰勒17项罪名{{{N. S. C.Hahn, “Neoliberal Imperialism and Pan\African Resistance”, Journal of World Systems Research, XIII(2), 2008,pp.142—178,<http://jwsr.ucr.edu/archive/vol13/Hahn\vol13n2.pdf>。}}}，其中包括深入涉入犯罪集团、犯下战争罪行、危害人类罪以及在塞拉利昂共和国的领土内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对泰勒的起诉书发表于2003年3月3日，但一直被密封至2003年6月4日才打开的。}}}

这个起诉使得寻求利比里亚境内和平的希望受挫。由于许多当时正在参加该和平会议的非洲国家元首的支持，包括科特迪瓦的巴博（Gbagbo）、加纳的库福尔（Kufuor）、南非的姆贝基（Mbeki）、尼日利亚的奥巴桑乔（Obasanjo）和马里的图马尼·杜尔（Toumani Toure）等，于是，对泰勒的逮捕令被忽视。而泰勒在事发后更是坐着加纳总统的专机回到利比里亚，因为当时有谣言，美国和英国的情报单位打算劫持泰勒的总统座机。{{{S. V.Paasewe, Neocolonialism in Africa — Liberia: the Last Target(Calabar:Uptriko Press, 2006), pp.190—191.}}}

两天之后，“利比里亚民主与和解联合”及“利比里亚民主运动”在利比里亚的战略城市发起一连串的军事攻击。这些攻击导致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随着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军事压力升高，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说，“泰勒总统必须下台，他的国家才能免于更进一步的流血冲突”。布什更进一步地说，当时的国务卿柯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正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一起合作。安南当时和非洲大陆的其他人正努力采取一些行动，以促使泰勒离开利比里亚。{{{Bush, New York Times, 26 June, 2003,<http://www.nytimes.com/2003/06/26/international/africa/26CND\LIBE.html>。}}}

2003年8月13日，泰勒流亡到尼日利亚，在他的告别演说中，他指控英国和美国借着武器禁令和其他制裁手段，不让利比里亚政府拥有自卫能力。他同时强调，利比里亚境内的战争其实是美国的战争，“利比里亚民主与和解联合”其实是一股代理的势力，是（美国）引起这场战争。{{{BBC News, “Taylor's Farewell Speech”,<http://news.bbc.co.uk/2/hi/africa/3140211.stm>, August 10, 2003.}}}

接着，美国策动了一场对利比里亚的军事侵略，一场联合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之一，并使得利比里亚成为联合国实际上的新托管地，而美国是主管机构。当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Sirleaf）2006年成为利比里亚总统时，她将泰勒事件定位为历史，已经过去。但是，在她访问华盛顿之后，她要求尼日利亚将泰勒引渡回利比里亚，并将他交给塞拉利昂共和国的特别法庭。{{{与利比里亚现任高官的私下交谈。 Interviewed by Niels Hahn,

February 5, 2009.}}}

国际体系的双重标准

批评特别法庭的人士进一步注意到，自 2000 年起，对泰勒的起诉以及对利比里亚的制裁，都是以利比里亚政府支持塞拉利昂共和国的反叛军“革命联合阵线”为由，这是证明国际正义与司法体系双重标准的绝佳例子。

这些批评人士指出，当国际社会指控利比里亚支持塞拉利昂共和国的“革命联合阵线”时，却刻意忽视了几内亚支持的有英国和美国撑腰的“利比里亚和解与民主联盟”（LURD）。虽然这些现象已经在许多国际报告中被注意到，但“利比里亚和解与民主联盟”在利比里亚叛乱背后的财务和后勤支持，却几乎未受到国际关注。{{{International\Crisis\Group, “Liberia: The Key to Ending Regional Instability” (London: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02), Report No. 43, April 24, p.4.}}}

2002 年 9 月 20 日，利比里亚的外交部长莫尼·凯普坦（Monie Captan）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该议题讨论，并指出“在利比里亚由国外势力支持的非政府武装部队发动的主要战争中，有刻意令一切保持沉默的阴谋”。当时“革命联合阵线”早已解散，凯普坦禁不住在大会上问道，利比里亚继续被安理会制裁的原因是在塞拉利昂已结束的战争中支持已不存在的革命联合阵线。他同时指出，对利比里亚武器禁运的制裁，是恶意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赋予利比里亚在受到武力攻击时自卫的权力。{{{Captan, “Address by His Excellency Prof. Monie R. Captan”,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to the 57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New York, September 20 2002,http://www.un.org/webcast/ga/57/statements/020920liberiaE.htm.}}}

关于国际司法在非洲双重标准的批评，并不仅止于塞拉利昂共和国的特别法庭。国际刑事法庭（ICC）也被指控沦为新殖民主义的工具。这个看法到了 2009 年 6 月，因国际刑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路易斯·莫雷诺—奥坎颇（Luis Moreno Ocampo）表示该法庭需要和美国的军队合作以执行其在非洲的逮捕令时，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S.AI\Bulushi, and A. Branch, “Africom and the ICC: Enforcing international justice in Africa?”, Pambazuka News—Pan\African Voices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Issue 143(2010).}}}

许多非洲的政治人物和评论员都有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国际刑事法庭要特别针对非洲人士，而非其他政客，例如托尼·布莱尔，乔治·布什，以及丹麦前首相、现任的北约组织秘书长安德斯·福格·拉斯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在伊拉克犯下的战争罪行？国际刑事法庭对苏丹总统巴希尔（Bashir）的起诉，使得许多非洲国家团结起来，反对国际刑事法庭。例如，在 2010 年 6 月，非洲联盟差一点通过一项决议，声明非洲联盟成员国不应该在巴希尔总统的逮捕问题上和国际刑事法庭合作。{{{Sudan Tribune, http://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page=imprimable&id_article=35765, July 26, 2010.}}}

利用种族屠杀、血钻石和名人塑造公众舆论

对塞拉利昂共和国特别法庭及国际刑事法庭的批评，正好符合了国际关系中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即视国际法乃强权国家为保护自我利益而制定的法律。在现实世界里，强国为所欲为，弱国量力而为。但是，既然在国际法中仅有非常少的法律执行机制，那么整个系统运作就极为仰赖世界公众舆论。{{{H. J.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McGraw\Hill, 2006).}}}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强权国家不会受制于公众舆论，而是通过宣传或心理战的手段，诉诸大众的理性认知、道德价值观、情绪的偏好、恐惧和罪恶感来塑造公众舆论。克林顿总统的前顾问约瑟夫·奈（Josephs Nye）以“软实力”一词来形容，借着影响“别人的偏好，来达到你想要的目的”{{{J. S.Nye, 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在国际政治中使用名人已经成为塑造公共舆论和架构辩论的有力工具。例如，美国想军事介入达尔富尔时，名人帮助世界舆论支持其介入。米亚·法罗和乔治·克隆尼公开表达对达尔富尔发生的残酷暴行的愤怒，并增强了种族屠杀的概念。{{Mia Farrow, “The Darfur Archives”, <http://www.miafarrow.org/darfur/archives.html>; ABC New, “George Clooney Speaks About Crisis in Darfur”, <http://abcnews.go.com/ThisWeek/story?id=1907005>, April 30, 2006.}}五百多个持不同政见的公民社会团体的联合进一步支持了由西方主导的军事介入达尔富尔。{{M.Mamdani, “The Politics of Naming: Genocide, Civil War, Insurgency”,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29, No.5 (2007), pp.5 — 8. <http://www.lrb.co.uk/v29/n05/mahmood/mamdani/the/politics/of/naming/genocide/civil/war/insurgency>, 8 March, 2007.}}此外，还有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例子，他表示因为中国与苏丹政府紧密的双方关系，将抵制中国主办的北京奥运。{{Telegraph, “Steven Spielberg boycotts Chinese Olympics”,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1578577/StevenSpielberg/boycotts/ChineseOlympics.html>, February 13, 2008.}}最后，中国在安理会中未动用否决权阻止联合国在达尔富尔的军事行动。

大部分学者和评论员都极为克制，并未针对这个事件提出太尖锐或重大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华盛顿可以将达尔富尔境内的冲突贴上“种族屠杀”的标签？为什么这个冲突与中国在达尔富尔和南部苏丹的石油开采权是相关的？更重要的是，谁资助了这个反叛军？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会将焦点立即转移到英国、法国、美国及其他盟友等强权角逐石油资源的角色上，而这些地方通常也是所谓的代理人战争及心理战主要的发生地点。正如伊拉克战争的发生，前美国联邦理事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lan Greenspan）指出，“承认这一点是有政治困难的……但是伊拉克战争主要是为了石油”，大部分的记者、学者和名人们，都避免不去将达尔富尔的石油议题和武装冲突联结在一起。{{A.Greenspan, *The Age of Turbulence—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7), p.463.}}达尔富尔除了境内拥有石油资源之外，该地区由于输油管线的部署，也成了战略要地。如果南部苏丹成功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美国非洲指挥部”将会接管南苏丹的安全事务，这么一来，很有可能中国石油公司在当地的优势会慢慢地被美国石油公司取代。即便如此，美国仍然需要将石油输出到境外，而极可能美国需仰赖从南苏丹到北苏丹港口的输油管。但是，乍得一喀麦隆（Chad/Cameroon）的输油管可以经过达尔富尔延长到南苏丹，这意味着取自南苏丹的石油，可以直接运抵喀麦隆，同时也使得石油运输到美国的船运路线更便宜而且更快捷，但前提是美国能够控制部分达尔富尔地区。{{N. S. C.Hahn, “Neoliberal Imperialism and Pan/African Resistance”, *Journal of World Systems Research*, XIII (2), 2008, pp.142—178,<http://jwsr.ucr.edu/archive/vol13/Hahn/vol13n2.pdf>. Section on The Rhetoric of Empire and Civil Society, p.157.}}

冲突地区的石油因素被忽略，而人道主义的介入成了冠冕堂皇的说辞，再加上好莱坞明星的关注，伊拉克和苏丹并不是唯一的例子。1992年美军在索马里的“恢复希望行动”（the Operation Restore Hope），对外解释为人道主义的军事介入，稍后好莱坞还和美国国防部合作，以该题材制作了一部2001年发行的热门影片《黑鹰坠落》（Black Hawk Down）。{{US Today, “Pentagon Provides for Hollywood”, <http://www.usatoday.com/life/movies/2001/05/17/pentagon/helps/hollywood.htm#more>, May 29, 2001.}}大部分评论员忽略了美军军事介入索马里的主动意愿和当地石油资源之间的联系。发动军事介入时，三分之二的索马里地区由美国的石油公司控制，其中最为人知的如康纳（Conoco）、阿莫科（Amoco）、雪佛龙（Chevron）和菲利普斯（Phillips）。康纳位于摩加迪沙的公司厂区，是当时实际上的美国大使馆及美军军事总部的所在地。{{M.Fineman,

“ The Oil Factor in Somalia ” , Los Angeles Times (Los Angeles: Nomadnet,1993),<http://www.netnomad.com/fineman.html>, January 18, 1998.}}根据一份已解密的摩加迪沙美国使馆呈交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康纳在索马里为了开采石油投入的资源,是其他石油公司无法相比的,从建设道路到机场,甚至招募保护油井的武装部队……维持安全”。但是,如果当地情况不稳定,康纳也没有办法从事任何活动。{{{Cable from US Embassy in Mogadishu to State Department Headquarters. 21 March, 1990. Cable Number: Mogadishu 02844.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release 2006\01\286 to Keith Yearman. See The Conoco—Somalia Declassification Project , <http://www.cod.edu/people/faculty/yearman/somalia.htm>, October 11, 2006.}}}

在利比里亚,石油的作用也同样被忽略。虽然利比里亚首次的石油开采早在 50 年前即已开始{{{W. R.Tolbert, Republic of Liberia—Presidential Papers. Documents, Diary and Record of Activities of the Chief Executive(Monrovia: Executive Mansion, 1971), p. 270.}}},而且石油资源的地理分布在 1982 年就已经被公开{{{GTZ(1982), “Resource map of Liberia” , Copy of specific pages can be retrieved at (nh40@soas.ac.uk).}}},大多数记者和学者们仍然不重视、忽略甚至完全驳斥利比里亚武装冲突和石油资源的关系。当公众注意力集中在名人和血钻石上时,雪佛龙于 2010 年 9 月宣布其“进入了利比里亚大有希望的近海地区”,这使得雪佛龙在该地区的发展策略得以超越其他对手。{{{Chevron, “Chevron to Acquire Deepwater Interests Offshore Liberia. Entry expands Chevron's presence in West Africa in a promising new geological trend”,

http://www.chevron.com/chevron/pressreleases/article/09082010_chevrontoacquiredeepwaterinterestoffshoreliberia.news, September 8, 2010.}}}

将达尔富尔的冲突称为“种族屠杀”,对索马里人道军事介入的鼓吹,以及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共和国“血钻石”概念的提出,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可以被视为复杂的心理战以及宣传的例子。这些都是强而有力的概念,试图将公众注意力从真正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转移开,同时鼓动公众对军事介入的支持。

一个支撑干预行动的受欢迎的概念和口号是“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这个概念首先是由加拿大政府成立的“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所提出的。“保护的责任”的基本原则是:“当一国人民因为内部战争、叛乱、镇压或国家动乱受到严重伤害,而该国无意愿或无能力停止或避免该状况时,不干涉的原则应改为国际保护的责任。”{{{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ICISS), Report of the ICISS 2001, p.XI. <http://www.iciss.ca/members/en.asp>.}}}

这些高尚的字眼和良好的出发点,让人很难不赞成。同样的,人权、民主和国际司法的概念,也很难让人不赞成。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概念的主要提倡者之一是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加瑞世·伊万斯(Gareth Evans),在保障澳大利亚公司石油开采权的过程中,他本人间接涉及东帝汶的违反人类罪。{{{John Pilger (1994), Documentary: “Death of a Nation”, from min. 0:56,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haBSPGBXco>}}伊万斯担任过国际危机组织的总裁,该组织参与了终结计划(Enough Campaign)、拯救达尔富尔联盟的活动,并与许多有影响力的政客如美国助理国防部部长劳伦斯·考尔伯(Lawrence Korb)及有关联的美国进步中心(the Center of American Progress)有联系。{{{Korb,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Lawrence Korb, Copenhagen, September 18, 2008.}}}

了解了这些重要的因素之后,“保护的责任”不禁有点像现代版的吉普林(Kipling)的“白人的包袱”,名人被用做提倡西方国家主导的军事干预的有力的宣传工具,而实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被装扮成正面的人道关怀。

金伯利认证的瑕疵

血钻石常被和奴工、谋杀、强暴、截肢及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9·11”事件之后不久，一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正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记者道格拉斯·法拉（Douglas Farah）写了一篇广泛的报道，将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及血钻石和基地组织连结在一起。法拉说，《华盛顿邮报》获得的一份军事情报清楚地显示，基地组织在西非从事秘密商业行动。根据《华盛顿邮报》的说法，基地组织的钻石事业于1998年9月开始，大概是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美国使馆遭轰炸后六周左右的时间。此外，“9·11”事件后，有两位资深的基地组织成员躲在利比里亚的格巴塔拉军营（Camp Gbatata）。{{{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9, 2002, p.A01, http://www9.georgetown.edu/faculty/irvinem/CCT510/Sources/washingtonpost/Africans_AI/Qaeda_Diamonds/12/29/02.html}}}

将西非的钻石和违反人道罪行及恐怖主义连结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影响了消费者对市场的信心。2000年，联合国安理会鼓励“国际钻石制造商协会”、“钻石交易所世界联邦”、“钻石高等议会”及所有其他钻石工业的代表，和塞拉利昂共和国政府协力合作，发展能够分辨血钻石（冲突地区）和非血钻石（非冲突地区）的方法，以期建立“原产地证书”的权威机制。{{{UN Security Council, S/RES1306 (2002), article 10,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N00/517/01/PDF/N0051701.pdf?OpenElement>, July 5, 2000.}}}

这些机构和公司建立了拥有最高命令权的“世界钻石议会”，以“发展、执行并监督裸钻进出口的追踪系统，防止钻石被非法的目的滥用在战争和非人道的行动上”{{{World Diamond Council, <http://www.worlddiamondcouncil.com>}}}}。这也促成了“金伯利进程国际证书制度”（KPCS，简称“金伯利进程”）的建立，该机制稍后于2002年2月6日被联合国大会承认。{{{UN General Assembly (2002), Resolution 56/263, “The role of diamonds in fuelling conflict: breaking the link between the illicit transaction of rough diamonds and armed conflict as a contribution to prevention and settlement of conflicts”,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N01/497/66/PDF/N0149766.pdf?OpenElement>.}}}

但是，“金伯利进程”是有瑕疵的。一份联合国专家小组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报告指出，根据在塞拉利昂共和国、几内亚、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的经验，要在河流的冲积物中区别来自冲突地区的钻石是有现实困难的。{{{UN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of the Panel of experts pursuant t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343, paragraph 19, concerning Liberia, 2001, p.16, <http://www.un.org/Docs/sc/committees/Liberia2/1015e.pdf>}}}

这个观点呼应了许多前任和现任的利比里亚政府官员的看法，他们早就注意到来自利比里亚的钻石可以轻易地被运到几内亚的首都科纳克里，然后取得一张原产地在几内亚的证书。实际上，金伯利认证机制对于该地区的钻石交易几乎未造成任何影响，许多泰勒政府的官员视“血钻石”一词为英国和美国策动的战争宣传，通过资助一些非政府组织如“全球见证组织”和“国际危机组织”等进一步散布这个概念。血钻石的概念在对泰勒领导的利比里亚政府的挾伐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对金伯利认证机制的提倡，确保了消费者对国际钻石市场的信心，尽管实际上不可能准确无误地区分“善”和“恶”的钻石。{{{J.Richardson(2009),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of Liberia under Taylor's administration, Interview recorded on February 21, by Niels Hahn, at the Royal Hotel in Monrovia.

C.Allen(2009), Chairperson of the National Patriotic Party of Liberia (NPP), during Taylor's administration Interview recorded on April 7, by Niels Hahn, in his home in Paynesville, Monrovia.

J.Dunbar(2006), Former Minister of Land, Mines and Energy, Republic of Liberia. Interview

recorded in his home in Monrovia by Niels Hahn, June 16, 2006.}}

吸引大众对泰勒审判案的注意力

金伯利认证机制并不能提供任何保证。即使米亚·法萝拥有一颗钻石，她也不能确定它的原产地。正如娜奥米·坎贝尔获赠自泰勒的钻石，即使多数主流媒体报道该钻石为血钻，它也不能被完全确定为血钻。

一个钻石盛产国的元首公开地使用钻石收买其他国家或个人的同情，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泰勒赠送几颗裸钻给一位超级名模，根本和他实际的法庭审判无关，要借此判定泰勒和塞拉利昂共和国的反叛军“革命联合阵线”有任何关连，也就是该案的核心关键，根本就非常困难。正当国际法庭逐渐被视为西方在非洲的新殖民司法管辖权的工具，把几位名人牵涉在泰勒的审判里，成功地吸引并操控世界的舆论去支持并相信一个正面的国际司法体系。但是，国际司法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这样的国际宣传也偏离了现实，并由超现实的好莱坞秀和超级名模及演员所取代。

如果要真正贯彻在非洲的国际正义，那么必须对冲突的根本原因进行严谨的分析，才能把所有战争罪及违反人类罪的嫌疑关键人找出来并加以起诉，然后接受审判。这会包括真正涉入冲突的组织，特别是其他外国势力，例如法国、英国、美国以及私人企业。

利比里亚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的最终报告的第 19 条陈述如下：在非洲的外国角色，北美和欧洲为了自私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利益或好处，参与、支持、协助、唆使、阴谋并策动暴力、战争及政变，以反对利比里亚的合法政权，反对利比里亚人民。{{{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Liberia (2009), Final Report of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Liberia (TRC), Monrovia. 1: Findings and Determinations.}}}

美国在西非地区特别是在利比里亚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要确保对在利比里亚境内的犯罪者给予符合国际正义的审判时，学者、记者和政府以及公民团体，应该认真看待 TRC 最终报告的第 19 条，并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特别委员会，调查 1979 年到 2003 年利比里亚冲突中的外国角色”，将这些对西非地区的战争负最大责任的国家置于国际司法法庭中接受审判的权限。{{{See Hahn (2009), “Recommendations to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Liberia”,<http://centrum.humanitasafrika.cz/en/library/catalogue/article/11>.}}}

或许尼加拉瓜和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案子可以提供一些经验，当时美国因非法使用武力对抗尼加拉瓜，被国际法庭判决为国家恐怖主义。{{{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Case Concerning the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1986),<http://www.icjij.org/docket/index.php?sum=367&code=nus&pl=3&p2=3&case=70&k=66&p3=5>.}}}

尽管该判决并未阻止美国进一步分裂尼加拉瓜，却使得美国的行动愈来愈困难，因为人民已经意识到外力对公民社会团体的刻意操控以及美国的宣传。

通过类似的方式，社会运动要求针对西非地区冲突的独立调查将使具影响力的外力角色受到关注。这也会增加一般大众对冲突的真正原因的了解，进而帮助学者、记者以及名人去提倡世界上真正的国际正义。

（蔡百蕙译，潘华琼校）